

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儿童形象研究(1947~1949)

霍玉英

(香港教育学院 中文文学系, 中国 香港)

摘要: 通过对 1947~1949 年间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发现, 其中主要刻画了两类儿童形象: 一是受压迫的童工; 二是思想进步的新儿童。这些儿童形象虽带有一定的政治化、成人化特征, 但是,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下, 其表达了创作者进步的社会理想, 有其真实性与功能性, 对当时小读者的创作与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儿童形象; 香港; 华侨日报; 儿童周刊; 许穉人; 读者会

中图分类号: I207.8 I20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0)01-0023-07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Children in Wah Kiu Yat Po Children's Weekly (1947~1949)

HUO Yu Ying

(Chinese Department Hong Kong Educational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tudy of children literature works in Wah Kiu Yat Po Children's Weekly (1947~1949), two kinds of images of children have been found: one is oppressed child laborer, the other is advanced new children. Although these images of children have some politics and adult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ey express the advanced social ideals of the authors, possess the reality and the function and also greatly influence the creation for younger readers' lif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image of children; Hong Kong; Wah Kiu Yat Po Children's Weekly; Xu Zhiren; readers society

《华侨日报》(1921—1995)是香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刊, 创立过不少副刊。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副刊, 先后有《儿童周刊》、《儿童天地》与《青草地》, 其中以《儿童周刊》(1947—1994, 下称《儿周》)最为长寿, 前后 48 年。战后, 左翼文人再度来港, 组织南方文化宣传队, 渗入传播机构并展开活动, 《儿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创刊。《儿周》创刊不到 1 月, 主编许穉人即透过(同“通过”, 下同)征文比赛吸纳读者, 引导组织“儿童周刊读者会”(下称“读者会”), 透过多元化的文艺活动培养干部, 积极推动华南文艺运动所倡议的普及路线。《儿周》既以儿童为读者对象, 作品蕴含不少内涵各异的儿童形象, 本文以发表在《儿周》(1947~1949)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探讨作者所建构的儿童形象, 并藉读者投稿、笔者与读者会成员的访谈, 旁

证这些形象的内涵与意义。

一、宣传阵地: 战后的香港

战后, 香港人口迅速回复战前的 60 万。^[1] 到 1946 年国共内战爆发, 大批人口涌入香港, 并急增至 160 万。^[2] 战后的香港百业待兴, 人口的激增益令居民生活更为艰难, 当中以物价、居住条件与劳工谋生最为艰难。^[3] 正因香港经济元气未复, 再加上劳资冲突, 中共较容易在工人阶级与教育界展开宣传势力及组织。^[4] 然而, 战后中共所以在香港开展工作, 原因有二: 一是国内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排挤与压制;^[5-6] 二是当时香港没有新华通讯社的办事机构, 也没有中共报刊传播主张与建国方略。因此, 在 1945 至 1949 年间, 香港成为左派最后、也是唯一的宣传阵地。

收稿日期: 2009-07-21

基金项目: 香港教育学院研究基金资助研究计划项目 (RG30/2006~2007)

作者简介: 霍玉英 (1958—) 女, 广东顺德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黄继持认为, 战后国共两党都分别派员在港活动, 但左派势力要比右派为大, 原因有二: 一、国民党宣传人员的无能; 二、港英政府微妙的策略与倾向。郑树森则指出, 国民党在文化界的组织及力量是松散的, 各个部门虽派员来港, 但没有完整的组织及统筹, 不比中共几员大将将在港指挥及统筹宣传活动。

② 1945 年 9 月, 南方局和周恩来派徐迈进与夏衍到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及《救亡日报》, 但因国民党的阻拦, 《新华日报》无法复刊, 《救亡日报》则改以《建国日报》复刊, 但不到 15 天, 即遭国民党查禁。中共于是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林默涵、廖沫沙、邵荃麟等人到港, 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人在港建立宣传据点。

日本投降不到1月,东江纵队《前进报》社长杨奇接获指示,与6名骨干人员到香港创办《正报》,成为香港战后第一家人民的喉舌。^[17]①与此同时,东江纵队秘书长饶彰风也率领干部陆续抵港,积极筹办《华商报》的复刊工作。^[18]②同年,新华社成立章汉夫负责的《群众》杂志和乔冠华、龚澎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也陆续出版。1947年初,中共成立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下设香港工委,专门负责香港、华南以及东南亚的统战工作。^[19]

与此同时,左翼文人也到香港创办杂志、出版社与书店。杂志大多以不定期的丛刊出现,像《文艺丛刊》与《学生文丛》,而出版社与书店则有“智源书局”、“生活书店”、“民主书店”、“初步书店”、“人间书屋”、“新民主出版社”等。再如办学则有“达德学院”、“南方学院”、“持恒函授学校”和“新闻学院”等,对香港文化发展有实质影响。^[14]③此外,中共还加入其他报章,以《华侨日报》为例,它的前身为《香港华商总会报》是一份工商界出版的报章,“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主要以香港的利益为出发点。《华侨》编辑和记者可能立场不同,有左派有右派,《华侨》并不干涉”。^[10]以引入《经济导报》的经济专才为例,林铃指出《华侨日报》创办人岑维休为扩大经济版,曾透过同学李启辉(《经济导报》督印人)引入陈文川、麦扬(麦克明)、容若思等专才。因此,《华侨日报》经济版在他们的主持下,曾经发表不少有利中共,但又与该报立场并不协调的新闻。^[11]

此外,《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主编侣伦也指出香港在内战期间再成为战斗的“后勤基地”,而报刊也就是南来文人渗透的主要目标:

国内的进步文化人又从四方八面来到香港。也是凭了地利关系,从事另一种政治意义的文化工作。他们除了出版《青年知识》这一类刊物,还在当时的几个报纸副刊上面投稿:如《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华商报》的副刊版,《华侨日报》的《文艺周刊》,《星岛日报》的《星座》……等都是他们发表文章的地方。^[12]

《儿周》主编原属意黄庆云出任,但因《新儿

童》编务繁忙,推荐了许穉人与胡明树主持该刊。许穉人为中共地下党员。^[13]主持《儿周》意在吸纳小读者,从而培植、提拔青年文艺干部,积极响应中共在粤港两地的文艺政策。据1946年的数据显示,《华侨日报》销数为38000份,占全港第一位。^[14]以党报宣传政见虽可收效,但透过全港销数最高的非党报宣传政见、吸纳读者,既可免去政治色彩,又利于讯息流播,对群众有较大的影响。

《儿周》创刊于1947年3月1日,是战后报章儿童版“拥有最多热心读者的副刊”。^[15]《儿周》虽为小读者而设,但许穉人强调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发刊词》中,许穉人指出战后的香港,缺乏健康的儿童读物,她呼吁关心儿童的朋友来为这片荒芜的园地播种耕作,并肩负导师的重任,引领小读者走向这片纯真伟大的国土,鼓励他们参与园地的播种与耕耘。^[16]为吸纳并培植、提拔青年文艺干部,《儿周》创刊1月,即举办第1次征文比赛,再由读者来稿所吸纳的小读者,不旋踵即成为《儿周》的作者。再加上在1947年9月21日成立的读者会,其所吸纳的基本成员,令“华侨日报‘儿童周刊’的一半地位,是读者自己编的。”^[17]1947年至1949年间,读者会举办不少活动,像郊游、比赛、出版刊物如“读者之声”与“组刊”、编辑“小信箱”、举办文艺讲座与讨论会、组织图书馆与筹建义学等,为小读者提供学校以外的学习机遇。半世纪过去,龙季莹认为在向人生道路举步的时候,《儿周》与读者会给她上了“最好的第一课”,^[17]而《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建章倡议成立的读者会更是“知识的摇篮”,^[17]④既启迪读者对社会的认识,还奠定部分读者正确的人生观,对会员日后的人生影响至为深远。^[18]此外,读者会举办了活报剧比赛与演出,其中以吴祖光《少年游》与许穉人《他们的梦想》的演出最令会员乐道,^⑤前者在会员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后者则让他们深信中国正朝着新生的方向走,而这一切都不是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的。^[19]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期间,近百名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南地区,中共在香港的活动遂告一段落。另外,在此期

①《正报》创刊于1945年11月13日,停刊于1948年11月13日,杨奇任社长兼总编辑。钟紫称在港英当局批准《正报》创刊前,早已到香港主要工团了解情况,为进步社团职工讲解时事,给夜校工人上课,使与进步工会的领导与工人建立良好关系,以便日后的宣传工作。

②1945年10月间,饶彰风等来港筹划《华商报》复刊工作,1946年1月4日《华商报》以日报复刊。刘思慕指出饶彰风在《华商报》复刊初期是以副经理的名义,代表地下党全面领导报社和它的附属单位。到了1947年,章汉夫出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报委书记,主管《华商报》的方针与政策。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5日,《华商报》自动停刊,报社全部人员进入广州,参加筹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

③卢玮銮认为中共所创办的学校虽含政治目的,但容纳了不少年轻的、失学的、流落在香港的内地青年及本地人,对香港教育,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深远影响。

④读者会的活动经费是由何建章每月在《华侨日报》拨款200元予以支持。

⑤“儿童周刊百期纪念文艺晚会”于1949年2月5日在香港岛上环青年会举行,会上除向百期纪念征文入选颁发奖品外,还演出话剧《他们的梦想》,出席大会并观看演出者千余人。

间，港英政府日益关注左翼人士在香港的活动，部署削弱他们在香港的活动，并针对公安、教育、出入境、社团、人口登记、驱逐不良分子与紧急法等，先后制订法例，以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妨碍殖民统治的机关与人物。1949年1月，38个社团遭香港政府拒绝注册。^[13]期间，超过60人被香港政府递解出境，读者会也在这个时候解散了。

二、受压迫的童工

抗战初期，香港因英国殖民地的身份，稍能侥幸免于战乱。1941年底，香港失守，居民或返回内地，或不得已滞留香江，经历战争的可怖、敌人的压迫与屈辱。战后，香港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但经济饱受破坏，居民生活困难，失学儿童多不胜数。^[14]①失学儿童中有的当学徒与婢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有的在街头卖报擦鞋，赚取微薄的收入；更有不幸者，因失去双亲而沦为乞丐，不得温饱。发表在《儿周》的作品中，作者便塑造了不少学徒、婢仆、报童、擦鞋童与乞丐的儿童形象，既反映战后社会现实，又为受压迫的一群发出呼号。

学徒不单要忍受工厂老板的刻薄寡恩，还得服从掌握一切权限的师傅，忍苦耐劳，唯命是听。学徒的工作是繁重的、龌龊的，粗活从早到晚，不得歇息。因此，作者笔下的学徒往往是备受压迫，形容枯槁。《人生是这样温暖》^[20]中那镜厂学徒小华，因无心打破一面镜子，先被师傅殴打，后遭解雇，回家后郁结成疾。《我的生活》^[21]中的印刷厂学徒，为帮补家计，不得不放弃学业，当个印刷厂的学徒。在工厂里，“我”不单要承担各种繁重的工作，还得受“领班”的责骂。白天的工作，再加上夜班，“我”每天得工作到晚上10至11点钟，翌日又要早起，“我”因而日渐消瘦。《我是一个织造厂的学徒》^[22]中的“我”也有着同一遭遇，工作时间从没规定，赶货时通宵达旦更不足为奇。涛声在《一个做鞋学徒的感想》文中曾经细致刻画了一个做鞋学徒的形貌，让读者如见其人。

做鞋的人他们都是挂着一副苍白色的面孔，和一条瘦弱而曲背的身躯，没有一个是强壮的，他们有着一双多起一层厚皮的手，和布满了刀痕的大腿，还有很多奇怪的状态，像左手的姆指特别扁大，二指特别弯曲，在左边胸部上起了一很厚的皮肉等等。虽然有些是例外，但却是极少数极少数。^[23]

做鞋工人每天坐在一张矮小的凳子上，做着12到14小时的工作，如涛声所言，“这就摧毁健康而有用的身躯最好的方法”。^[23]备受压迫的一群有改变现状的可能吗？作者似乎只能透过主人翁的诘

问，向上天发出无力的呼喊：

我的童年却是这样的不幸，是谁赐给我的呢？难道我的童年注定没有幸福的吗？^[24]他们（学徒）不是都步着摧毁他们自己有用的身躯的途径吗？不是都在磨灭了他们底活泼宝贵的青春吗？这是谁令他们这样做的呢？我想问。^[23]

此外，学徒虽有心向学，但往往遭受老板与师傅的阻挠，剥削他们读书写作的时间。像《告假》中的小波，^[24]他想请假参加读者会，但遭到老板“晓以大义”，要他尽自己的“责任”——做工、煮饭。《我是一个织造厂的学徒》的小学徒在加入教会后，因为得到宗教的庇荫，刻板的生活渐次点染了色彩，他看书、写日记、参加演讲……但师傅总借故斥骂、阻压他向上的思想。再有不问因由的主人，毒打不敢反抗的女仆，像在《可怜的女婢》中的女仆，便因为忍受不住虐待，消极地以死结束宝贵的生命。^[25]《救救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所展示的更是一个奴隶世界，女仆偷偷讲了些话，女学生在黑板上写上“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她们便遭受鞭打的酷刑。在“我是主你是奴”的社会里，受压迫的一群都噤若寒蝉，不敢反抗，许穉人虽在篇末为之发出呼喊：“我们要自己动手来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26]，然而，只要受迫害者不敢起来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反对不合理的待遇，奴隶世界便永远没法消除。

可幸社会上不尽是压迫弱者的剥削阶级，同情弱小孤寡、受苦者相濡以沫，彼此互相帮助的也比比皆是。在《人生是这样温暖》中，小华幸有读者会的友侪帮助，为他筹措医药费，而医生因感动于小朋友间的友爱关怀，竟不收分文，诚如小华所言：“人生是这样温暖，人并不孤独”^[29]。在《孩子的爱》中，陈云孤身一人到处流浪，他的生活并不容易，但遇上与他同龄的可怜儿时，他愿意把一天辛苦得来的工资，还有那准备买1支牙刷的钱，全数用到那可怜儿的身上，为他买药。许穉人在篇末以明亮的颜色，为这受压迫的人儿，预示了美好的明天：

窗外的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天亮了，人们都到庙里来，看见那两个孩子还互相拥抱地睡着，嘴角挠挂着一丝丝的微笑。^[27]

徐虹在《一个倔强的卖报童》里塑造了一位倔强的卖报童，他14岁左右，长得矮小瘦削，但“眼睛带着营养不足的枯黄色，但却似潜伏着一种光芒机敏而沉静地隐隐闪烁着”^[28]。虽然，卖报童工作勤快，不肯向现实屈服，但为了“吃饭”，他却不惜与同行互相殴斗，争夺“地盘”，彼此看作仇人。对此，“我”感到无限的悲哀，因为受压迫者没有弄清——迫使他们贫穷饥饿的才是真正的敌人，而非同样遭

① 1945年10月5日，《工商日报》社论狠批香港文化教育，认为失学的儿童只有准备作阻街的“后备犯”，或蹲在街头看连环图。此外，学校教育就算办得顶完善，也不过增加极少数目的知识分子而已。

受压迫的弱者。《一个倔强的卖报童》发表后 1 周,许穉人以戏剧《互助》^[29]深化相类的主题。小乞丐小牛和洪仔同是战后香港社会上贫困的底层,靠着行乞渡日。饥饿不单让人丧失理智,也失去做人的尊严,为了 5 分钱,两人终而反目,互相争斗。如工人叶强所言,小牛与洪仔并非敌对的对方,他们真正的敌人是不合理的社会,是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他们的人。受压者要过好日子,不出两者,一为自力更生;二为团结起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小牛与洪仔在叶强精神的鼓励与物质的扶持下,展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再者,小学生陈云因感动于叶强的义行,也捐出与姐姐看戏的钱,交与小牛与洪仔,作为经营卖报行业的本钱。苦难的人彼此帮助,相濡以沫,他们并非孤独的一群。

《儿周》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往往走向两极:一是生活困苦、备受压迫的孩子;二是生活优裕、不知人间疾苦的少爷小姐。不过,在受苦受难的孩子身边,不无思想进步的份子,在他们的指引下,受压迫者明白了受压迫的原因,也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于是,受压迫的孩子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新社会。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究属作者的空中楼阁,还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读者会成员伍志强因中日战争而辍学,香港沦陷后返回内地,战后又从内地返港,生活艰苦,最终不得已当个“下栏尾”,受尽歧视与折磨,就这段经历,他有这样的忆述:

我在日本铁蹄下成长的,童年苦不堪言。日本投降后,生活未有改善。返港后,因为生活,我以“下栏尾”的工作维生,但这份工作不单令我受人歧视,还遭到黑社会的蹂躏,以至师傅无理的斥责。后来再因沉溺在各种陋习(抽烟)中,我更感前路茫茫。偶然读到《儿周》,很受感动,于是毅然投稿。读者会成员对我关怀备至,旅行时对我念念不忘,在《花絮》中更表达了因我缺席而遗憾的话。认识何若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深夜详谈,何若了解我的苦闷,鼓励并指示出路,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自由、民主、新中国与革命等新鲜的名词。我把对前途的忧虑向何若和盘托出,同时也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痛恨,觉得中国必须来一次全面的变革。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接受了何若的指导与影响,其后再而影响别人。^①

——笔者与伍志强、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6月30日)

许穉人在《小倔强》所塑造的小强^[30],仿佛就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伍志强”。小强的母亲早逝,父亲因工折断了一只手,于是不得已辍学,当裁缝学徒以维持生计。小强不单品性善良,同情弱

小,他还好学用功,因着“我”借给他的书,增添了許多知识,许多勇气。如果“我”以书本给小强指引,让他思想进步,那么,小强其后带着受老板娘欺负虐待的新学徒离开洋服店,在偌大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路,则可视作受压者起来反抗的表现。小强以至现实生活的“伍志强”,他们都是受压迫的人们,但因为得到思想进步份子的熏陶与导引,既丰富知识,也长足了志气,毅然挺身反抗,站在时代洪流的最前端,为创建合理的社会而奋斗。像小强、像“伍志强”等受压迫的儿童形象,实有他历史时代与社会背景的意义。

此外,许穉人一意描摹这些儿童形象,同时也有他的功能意义。如前述,《儿周》的创办与读者会的组成,旨在吸纳有用份子,因此,作者在《儿周》一再塑造受压迫,但继而奋起的儿童形象,实有助吸纳积极的读者,将其培养为建设祖国的中坚份子。诚如伍志强所言,受压迫者“接触《儿周》后,便好像找到一个灯塔,虽然不知将被引领到哪里去,但它让读者拥有一个方向。”(笔者与伍志强、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6月30日))今天重读发表在《儿周》的作品,必须把它纳入战后中国政局大环境以及当时香港的社会现实加以诠释,否则无法明白“我以我血荐轩辕”^[31]的“少年轻狂”,无法理解一群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青少年,在“华侨日报儿童周刊”主编许穉人的指导下,参加了读者会各种活动,并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培育了爱国主义思想,以至后来回国加入了游击队,配合人民大军南下,迎接华南的解放。^[32]读者冯飞凤在上世纪50年代返回内地念书,在访谈中,她回首当年抉择,指出,“《儿周》不但提高儿童的文学文化水平,还培育了一群有志气、真挚朴素的年轻人”(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伍志强、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7月7日)),肯定了《儿周》与读者会给她的启迪与培育。

三、思想进步的新儿童

《儿周》早期作品的政治意识浓厚,意在吸纳思想进步的读者,使成为改革社会,创造新中国的中坚份子,读者中有认为“一生的理想和事业是从‘儿周’开始的,是‘儿周’把我(吴文法)领上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33][34]}。由《儿周》衍生的读者会,更是进步份子的实习场所,举凡郊游、文艺活动、文艺讲座与讨论会、组织图书馆与筹办义学,让年轻读者把已得与所学,应用在实际工作上。活动前的筹备工作,活动中的团结合作与活动后的反思检讨,都是许穉人的精心设计,让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施展所长。读者会核心人物龙季莹这样记录当年的青春岁月,以

①有关何若对伍志强的深远影响,还可参看伍捷(伍志强)的《丰盛的缅怀:纪念华侨日报儿童周刊读者会五十周年》一文。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及《儿周》。读者会与许穉人对他们的启迪与影响：

副刊主编许穉人先生，亲切热情地来到我中间，她谆谆善诱，通过《周刊》上的华章，读者会的读书、歌咏、舞蹈、特别是《他们的梦想》的演出，展示一个美满的社会，在那里，贫苦和受压迫的青少年都有美好的生活和工作，有为祖国繁荣而奋斗的机会。^[19]

以作品为例，许穉人每以篇幅短小的生活故事带出政治议题，像《民主精神》^[34]与《革命精神》，既为读者阐释民主与革命精神，还以孩子的话表达美好的意愿。“我们孩子这一代，只要先生肯教导，也一定能发挥革命的精神，把国家社会的坏现象改革。”^[35]诚然，作品中的师长对受压迫者起着灯塔的作用，但稍长的同侪也是思想进步的份子，不单有参与改革事业的宏愿，还鼓励了迷惘，但满有志气的儿童，使他们成为思想进步的有用份子。或有批评许穉人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过于单一，人物性格的刻划也嫌简化，但在现实生活不难找到他们的原型，像读者会年纪稍长的成员何若。伍志强在访谈中一再感激何若对自己的导航作用：

是他首次给我解析剥削和被剥削，是他借鲁迅的诗文给我读；是他将我当时的职业状况，写成《下栏尾》一文，登载在 1948 年 2 月 23 日香港《华商报》的《热风》版上；是他鼓励并和我及甄瑞富在游艺会演活报剧《收租》。^[36]

读者会成员中，以在学儿童居多，家庭经济较在职青年组为佳，像何若、龙季莹、冯飞凤等。然而，他们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以一股热情关爱弱小，鼓励他们奋起争取合理的生活，创建平等健全的社会。在《小明的疑问》，许穉人便塑造了小明与小云两位富同情心、思想进步的小孩。善良的小云同情乞丐小黑子，把手上的饼食分给他，但势利的母亲不单斥责小云，还把饼食扔给家里的狗，不肯施予。由小见大，小明质疑人们为甚么不能自由平等过着亲爱的生活，于是立志要当解放黑奴的林肯。^[39]就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议题上，许穉人又发表了《爱》和《孩子这一代真是了不起呀》当中塑造了几位年轻，但思想进步的新儿童。在《爱》里，小筠既愤慨竟在战后强迫人民缴交 7 年来的“抗战谷”的腐败政府，又同情因内战而再受破坏的家庭。小筠虽然年轻，但明白团结弱小的力量必成大器，她向父母亲表达了高远的理想与呼吁：

我要呼吁国内和平，不要再拉壮丁，不要再制造这许多孤儿寡妇，等我长大了，有能力，我还要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我要把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改造成合理的社会……^[37]

小筠怎样达成她的理想？像全心投入读者会活

动的成员一样，她想到写呼吁和平的文章，投到《新儿童》投到《儿周》期引起同侪的响应，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以迫使政府停止内战，让陷于内战的士兵得以回乡。在《孩子这一代真是了不起呀》子山为争取民生与自由，竟为暴徒所伤。弟妹不过是 10 来岁的学生，但懂得打起“争取自由，弟弟援助哥哥”^[38]的旗子，做哥哥子山的后盾。在许穉人的笔下，小筠、小明与小曼的形象也许过于理想，但这正是中共吸纳党员，培养成为干部的目标。再证之读者会举办的种种活动如文艺讲座、讨论会、观赏革命电影、话剧演出等等，主事者莫不以此朝向改革者的培养工作。

踏入 1949 年，中国大陆政局产生巨变，许穉人以“小小颖”的笔名发表了政治意味更为浓厚的作品。在作品中，许穉人往往以第一人称的“我”，把日常参与的政治活动融注到儿童的生活里。《新生的一代》中的哥哥、姊姊、小明、小云、何菲和“我”都不过是中小学生，但他们组织了读书小组，当中既谈时事，也讨论作品。许穉人笔下的读书小组甚有规模，在全国学联成立和华南学联成立问题上的讨论，哥哥当了主持，先发表学联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再由姊姊、小明和何菲表达如何向应成立学联成立的想法。^[39]虽然，有或质疑许穉人笔下的儿童形象过于成人化、政治化，其所表达者不过是党员口吻而非 10 多岁儿童的观察与识见。然而，据伍志强与吴锦勋的忆述，读者会成员中曾自发组成“读书组”，研习政治、哲学与文学作品，为迎接华南解放而努力。（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伍志强与吴锦勋的访谈〈2008 年 7 月 7 日〉）

1949 年“五四”前夕，许穉人在《爸爸讲五四历史》透过参与“五四运动”的爸爸，讲述了“五四运动”的由来。^[40]其后，再以《怎样纪念“五四”？》向年轻一代宣示，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后，即要肩负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任务。^[41]如何承担庄严的任务？小小颖从个人锻炼、帮助他人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三方面侃侃而谈，表达了一位新儿童的志向。在现实生活中，吴锦勋在 1949 年 2 月演出话剧《他们的梦想》后，便与龙基、伍志强开了几次秘密会议，计划返国，期进入游击区参与游击战，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①

《儿周》既是以年轻读者为对象，作品中每以儿童为中心，“小颖周记”便是一例。许穉人把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自由等政治议题，变作小颖日常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逐一为读者阐释时局。以第一周《为甚么要反扶日》为例，哥哥与父亲透彻地分析了战后美国扶日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工商业的影响。

① 笔者与伍志强、吴锦勋 2008 年 6 月 30 日的访谈中伍志强也指出，在演出《他们的梦想》后，读书组有过一次深入的讨论，部份核心成员决定离开香港。

小颖虽被哥哥称作“你还少〔小〕不懂也算了”，^[42]但好学先进的她却不以为然。她反驳说：

我为甚么不懂就算呢？我已经初中学生了，我要懂，我想哥哥懂这些东西都是由报纸得来，我不也会看报纸吗？因此，我决定了以每天看一小时报纸，以丰富我自己的知识。

许穉人笔下的小颖是新中国的理想儿童形象，拥有了解国事、关心民间疾苦、勇于改革的进步人格。在《谈电影》，哥哥为小颖指出电影是有意义的艺术，一出好的电影能教育那些无知而犯错误的人，让他们思想进步。由此，小颖即想到读者会小组中两位当学徒的朋友，希望能给呻吟在生活重压之下的职业青年信心、勇气和希望，使沮丧自卑者一变而为奋发自尊的人。^[43]“小颖”正是许穉人致力培养的《儿周》读者与读者会的成员，她年少，但富同情心，关注弱势社群，受益于师长的指导后，即能踵武其后，再而影响他人。作品的儿童与现实中的少年，不单互为呼应，还显示了“召唤”的功能，像何若，“他有一种领袖的魅力，令人不其然会亲近他、认同他的理想。”（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伍志强与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7月7日〉）许穉人以志气非凡的新儿童形象吸引同龄的读者，呼召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四、结 语

战后的香港，以她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成为中共的宣传阵地，南来文人在此间创办报刊、书店、出版社与学校，加入到传播机构，用以宣传中共的主张与建国方略。因此，吸纳人才更成为建国的有用份子，是党员的任务，有读者会成员回忆当年师长对他们的关怀与指导：

周而复等有名的共产作家来到我们中间，细心为我们解说，很难想象他们竟花时间为我们这些黄毛小子解答问题。

——笔者与冯飞凤、何天樵、伍志强与吴锦勋的访谈（2008年7月7日）

建立一个平等、自由与合理的社会不单是这一群年轻读者的任务，还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的梦想”。经历近半世纪，龙季莹说到当年的热情与追求：

我们争读进步书刊——《青年知识》及高尔基的作品，我们热烈争论；我们年纪不大，却忧国忧民，忧心祖国人民生活于苦难中；我们热切要求投身革命，报效祖国。^[44]

《儿周》作品中所呈现的儿童形象，虽或过于政治化、成人化。然而，战后，香港以它的特殊的位置，因着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造就了《儿周》与读者会，而作品与现实互为交错的受压迫的童工与思想进步的新儿童，不单有其真实性与功能性，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还指示了战后香港的特殊意义，为香

港写下一页独异的历史。

[参考文献]

- [1]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6 [M].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7.
- [2]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8 [M].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9.
- [3] 刘蜀永. 简明香港史 [M]. 香港: 三联书店, 2002.
- [4] 郑树森, 黄继持, 卢玮銮. 国共内战时期 (1945 ~ 1949) 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三人谈 [M] / 郑树森, 黄继持, 卢玮銮. 国共内战时期: 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 (1945 ~ 1949) (上册).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9.
- [5] 余绳武, 刘蜀永. 20 世纪的香港 [M]. 香港: 麒麟书业有限公司, 1998.
- [6] 夏衍. 白头记者话当年——记香港华商报 [M] / 钟紫. 香港报业春秋.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7] 钟紫. 正报记者生活的回忆 [M] / 钟紫. 香港报业春秋.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8] 刘思慕. 香港华商报的国际时事宣传及其它——我进华商报的前后 [M] / 钟紫. 香港报业春秋.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9] 亚历山大. 葛量洪回忆录 [M]. 曾景安. 译.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4.
- [10] 访问华侨日报社长岑才生先生及编辑甘丰穗先生 [M] / 何杏枫. 《华侨日报》副刊研究 (1925. 6. 5—1995. 1. 12) 资料册.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华侨日报》副刊研究”计划, 2006.
- [11] 林铃. 历史悠久的香港华侨日报 [M] / 钟紫. 香港报业春秋.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侣伦. 40 年代的光与暗 [M] / 侣伦. 向水屋笔语. 香港: 三联书店, 1985.
- [13] 何天樵. 青年生活 [M] / 何杏枫. 华侨日报副刊研究 (1925. 6. 5—1995. 1. 12) 资料册.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华侨日报》副刊研究”计划, 2006.
- [14] 香港年鉴编辑委员会. 香港年鉴 [M]. 香港: 香港年鉴社, 1947.
- [15] 黄庆云. 华南儿童文学运动及其方向 [M]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 文艺三十年. 香港: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 1949.
- [16] 发刊词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3-1(1).
- [17] 龙季莹. 序言 [M] / 吴锦勋, 伍志强, 吴文法. 峥嵘岁月: 原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创刊暨读者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香港: [出版者不详], 1998.
- [18]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读者会 [M] / 香港文化、教育、艺术社团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联欢会. 光辉的足迹: 原香港文化、教育、艺术社团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特刊. 广州: 广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 1997.
- [19] 化偏枯, 求普及——从本港的文化教育现象说起 [M] / 郑树森, 黄继持, 卢玮銮. 国共内战时期: 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 (1945 ~ 1949) (上册).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9.
- [20] 穉子. 人生是这样温暖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11-15(37).
- [21] 李怡. 我的生活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5-10(11).
- [22] 李青. 我是一个织造厂的学徒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10-11(32).
- [23] 涛声. 一个做鞋学徒的感想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

- 7—26(21).
- [24] 新. 告假[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9—27(30).
- [25] 雯. 可怜的女婢[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6—21(17).
- [26] 穉子. 救救我们这一代的孩子[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8—30(26).
- [27] 穉子. 孩子的爱[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4—26(9).
- [28] 徐虹. 一个倔强的卖报童[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5—8(62).
- [29] 穉子. 互助[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5—15(63).
- [30] 穉子. 小倔强[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4—17(59).
- [31] 伍捷. 丰盛的缅怀: 纪念华侨日报儿童周刊读者会五十周年[M] /吴锦勋, 伍志强, 吴文法. 峥嵘岁月: 原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创刊暨读者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香港: [出版者不详], 1998
- [32] 郭锦城. 感想[M] /吴锦勋, 伍志强, 吴文法. 峥嵘岁月: 原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创刊暨读者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香港: [出版者不详], 1998
- [33] 吴文法. 情系几周[M] /吴锦勋, 伍志强, 吴文法. 峥嵘岁月: 原香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创刊暨读者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香港: [出版者不详], 1998
- [34] 穉子. 民主精神[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3—15(3).
- [35] 穉子. 革命精神[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3—29(5).
- [36] 穉子. 小明的疑问[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3—22(4).
- [37] 穉子. 爱[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7—8—9(3).
- [38] 小颖. 孩子这一代真是了不起呀[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4—24(61).
- [39] 小小颖. 新生的一代[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9—3—12(106).
- [40] 小小颖. 爸爸讲五四历史[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9—4—9(110).
- [41] 小小颖. 怎样纪念“五四”? [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9—4—17(112).
- [42] 小颖. 小颖周记·为甚么要反扶日[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7—17(73).
- [43] 小颖. 小颖周记. 谈电影[N]. 华侨日报·儿童周刊, 1948—9—25(83).
- [44] 龙季莹. 青少年的启蒙小天地[M] /香港文化、教育、艺术社团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联欢会. 光辉的足迹: 原香港文化、教育、艺术社团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特刊. 广州: 广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 1997.

(上接第 22 页)

除以上所说, 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关注当前某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值得重视。如维吾尔族艾贝保·热合曼的《出远门的少年》、朝鲜族梁永哲的《小男孩与青龙大刀》, 前者写少年穆合塔尔进县城与父亲走散后被拐骗后一路上的遭遇, 面临即将被运送到内地的阴谋, 他打定主意要逃跑; 后者写一个父亲下岗、母亲傍大款的小男孩, 为寻找父亲并为父“报仇”而离家出走的男孩, 写他出走后的流浪以及与“我”的相遇。这两个作品全是小说, 内容却很现实, 显示出民族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用极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 写得真诚投入, 让我们读出了其他作品中没有的一种隐匿的忧伤和愤懑, 读出了另一种视角下民族少年可悲的生活图景。这是民族作家对儿童成长主题的一种开掘, 他们切入的是儿童文学创作总也离不开的家庭、学校、社会的领域。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 广东省回族儿童文学作家王俊康主编的、由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校园诗歌朗诵集》(上、下集, 并附朗诵、音乐光盘)。广西壮族作家刚夫的《海底科普寓言》(一套五册)获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第四届金骆驼奖一等奖。无论是内容的独特、表现的新颖, 在中国各民族儿童文学中都属“第一”。

令人分外欣喜的是, 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儿童

文学的多了起来, 而且大都起点较高。不过, 欠缺的事也总是有的, 比如, 民族诗人不算少, 但真正为少年儿童写诗的诗人有多少? 童话是儿童们最喜爱的一种作品, 而民族作家创作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童话也极少^[1]。有意思的是, 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源头看, 诗和童话恰恰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最早、最兴旺的作品。事实上, 民族作家中真正称得上是民族儿童文学作家的, 只是有数的几位。其实, 民族地区儿童的生存状态、生活状况, 也有许多值得民族作家关注、关怀的, 比如彝族余继聪的散文《幸福其实很简单》中写到的滇中高寒山区板凳山小学的彝族小学生们, 他们贫穷却进取、幼小也勤劳的件件事情, 都撼人心弦。我想, 民族作家们能到那里去走走, 定能写出更具震撼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 这只是眼前想到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说是“少数”实非少数^[2]——55个少数民族的儿童生活是怎样的多姿多彩呢!

[参考文献]

- [1] 张锦贻. 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发展与突破[J]. 昆明学院学报, 2008, 30(3): 6—9
- [2] 张锦贻.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30 年[J]. 昆明学院学报, 2009, 31(1): 25—30